

从独立到依附：阿里王朝时期埃及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换与探索*

李芳洲**

内容提要 在埃及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阿里王朝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既是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也是其谋求经济独立创新发展的探索。由于不同时期对世界市场经济的反应不同，埃及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穆罕默德·阿里实施强制性现代化，推动进口替代，以埃及帝国体系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伊斯梅尔的欧洲化改革，使埃及放弃了自给自足，大踏步地融入世界体系；英国占领时期，埃及经济在世界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但也催生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并开始探索经济自主与独立之路。虽然自由主义时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推动了埃及现代民族工业发展，但外国商业精英依旧在埃及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发展道路最终都宣告了不同程度的失败，它们不仅未能使埃及实现复兴，反而将之带入边缘化的依附境地。综观阿里王朝时期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其利弊更多取决于不同时期国家与企业家对世界市场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 埃及 阿里王朝 现代世界体系 经济发展 米斯尔银行集团

在中东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阿里王朝（1805~1953年）统治时期是埃及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早期发展时期。这一经济转型既是宏观视域下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也是微观视角下埃及谋求经济独立与自我创新发展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开放课题“依附与自主——埃及阿里王朝经济发展道路选择”（21YDYLY0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青年教师创新能力计划项目成果之一。同时，本文也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提档升级世界史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

** 李芳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展的探索。此时，埃及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在埃及近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埃及由东地中海的一支独立力量，逐步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并遭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后来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昭示人们，像埃及这样的亚非国家，在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挑战的情况下，既不能如同阿里时代那样完全拒之于千里之外，建构新的帝国体系与之对抗，也不能不计成本地强行融入。当然，埃及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也塑造了埃及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后来埃及的独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对近代埃及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研究，有学者以文明交往与现代国家体系为视角进行了深度分析与总结，认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是文明交往中挑战与应战的交锋，是文明交往中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更是文明交往中危机和机遇的交织。^① 埃及应该怎样应对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本文结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尝试系统阐释阿里王朝的经济发展道路，以便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独立的“埃及帝国体系”

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805~1848年在位）以前，埃及是奥斯曼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它既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也是帝国境内大型贸易交易中心，其中咖啡过境贸易对奥斯曼世界体系和当地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加剧以及咖啡等转口贸易量的下降，埃及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农民赋税沉重，加上洪水和疾病的侵袭，18世纪中叶的埃及社会处于全面危机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又遭到英法等国的相继入侵，面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穆罕默德·阿里的应对方案是建立“埃及体系”或“埃及帝国”，^② 以埃及的“帝国体

① 刘会清、王泰：《试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及交往性特征》，《西亚非洲》2007年第9期，第54页。

② Alan R. Richard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Egypt, 1798-1882,”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1, No. 2, 1977, p. 4.

系”去对抗欧洲的“世界体系”。于是，穆罕默德·阿里开启了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和强制性现代化的进程，埃及经济社会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①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致力于巩固统治地位和消灭异己，最后成功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马穆鲁克，成为埃及无可争议的领袖。关于埃及未来发展，阿里深知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推翻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是埃及人民的共同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埃及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工农业，以富国强兵。阿里认为法国人之所以能够发动征服埃及的战争，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武器和组织，而这些因素都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工厂制度有关。^②所以，埃及也要走工业和军事建设相结合的道路，用强大的工业支撑军队建设，最终建立起一个脱离了农业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军工生产还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埃及都需要巨大的财政资源。为此，阿里着手改革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模式，以提高生产力，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③

1811~1815年，阿里启动了土地改革计划，其目标是将农业剩余集中在一位全能“企业家”掌管的国家手中。^④首先，国家垄断农田，废除包税制，采用新的税收制度，以村庄名义登记土地并且直接向国家纳税。其次，对农村和城市土地（包括所有宗教地产）进行地籍调查，以评估它们的价值，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确定不同的土地税。废除宗教地产免税的特权，还将一些土地分配给其家人、臣属，以及在政府任职的本土埃及人。任用曾经在马穆鲁克时期作为村落首领的埃及本地贵族，赋予他们收税和在村庄一级代表政府的职务。为了鼓励农村行政人员承担这些职能，授予他们每105费丹土地中大约5%的土地作为奖励。^⑤这样，埃及在土地国有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31页。

②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35.

③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34.

④ Jean Batou, "Nineteenth-Century Attempted Escape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Cases of Egypt and Paragua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16, No. 3, 1993, p. 283.

⑤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9.

上扩大了税收、强化了国家权力，为埃及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阿里及其支持者鼓励扩大埃及的农业出口，以便从种植的农产品及原材料中获利。阿里在农业创新领域的首要举措是倡导引进新作物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1820年长绒棉的引进，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埃及生产的既廉价又对外界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短绒棉的局限。由于长绒棉的纤维结实而富有弹性，用其生产的棉布质地精良，深受欧洲市场的欢迎，价格是短绒棉的2~4倍。在法国专家帮助下，埃及棉花的集约化种植模式提升了棉花的出口产量。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增至24万坎塔尔（1坎塔尔=45公斤），^①棉花成为当时埃及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农民也由此首次与政府直接接触，开始了强制性劳动生产方式，农村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转变。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获得可持续的农业剩余，阿里建立了用于灌溉和排水的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阿里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沿着尼罗河修建水坝和堰）是埃及农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使埃及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也将埃及的种植方式从依赖尼罗河盆地的自然灌溉向常年灌溉转变。新灌溉的土地除了种植棉花外，还用于种植甘蔗、靛蓝和亚麻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作物。一些传统上庄稼一年一熟的地区变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更重要的是阿里还强化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利用农业利润资本平衡政府在军队、教育、工业等方面的支出。从1812年开始，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购买农作物，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转售给埃及消费者，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售给外国商人。这样，阿里控制了埃及95%的出口，其外贸垄断利润（一半或更多来自棉花）提供了政府预算收入的1/4~1/3。在进口方面，不允许与政府控制的工厂竞争的商品进口。^②通过国家垄断，埃及政府显然是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③当然，埃及农业发展已经逐渐向单一出口经济作物转型，满足欧洲工业化对

① 哈全安：《中东国家史 610—2000：埃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45页。

②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

③ 刘志华：《1805—2011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刍议——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39页。

原材料的需求。^①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早期改革的目标并非改善埃及的农业。相反，其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国家一切改革的基础。阿里认为文明（至少是欧洲文明）是组织、武装和维持军队的一套手段，也是维护独立的最好保证。^② 所以，阿里按照欧洲军队模式对埃及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聘用欧洲军官、招募农民入伍，并为军队配备最新的武器装备。阿里的军队负有双重使命：一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得外国土地，二是为当地工业产品获取销售市场。为了保障现代化军队所需的技术和服务，阿里发展并完善了教育体系，在埃及兴办各类院校，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发展战略。尤其是埃及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仅能从事新的职业，而且还要将在欧洲学习时的课本、讲稿和其他阅读作业翻译成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阿里还建立了一套欧式的公立学校体系，最初学校部分员工是欧洲人，但逐渐都转变为在欧洲留学归来的埃及人。与当时盛行的传统爱兹哈尔管理（Azhar-supervised）的学校系统相比，穆罕默德·阿里的公立学校系统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③ 当然，阿里看到了引进技术的必要性，而教育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总之，穆罕默德·阿里通过改革农业和农田管理，为国家崛起调动财政资本；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获得对外军事征服所需的人力资本，依靠外国技能培训和教育当地人力。这一切努力使阿里也成为当时埃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宏大工业发展计划又使他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工业企业家”。^④ 在他看来，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解决就业和创造收入的唯一来源，而是实现他雄心勃勃的政治帝国的手段，或者说他利用“企业利润”实现政治目标的早期实践。阿里的理想是创造技术上与欧洲标准相当的新产业，他的工业计划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

-
- ① Naïem A. Sherbiny and Omai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37.
 - ②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91, p. 56.
 - ③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91, p. 58.
 - ④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91, p. 58.

阿里统治之前，埃及自己的小规模传统工业在全国范围内运作；二是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在开罗建立了现代化工厂，生产面粉、啤酒、帽子、皮革和军火等一系列产品，其工业生产模式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参与机会和经验；三是阿里受到了法国学者的影响。著名的《埃及描述》记载了法国学者进行的广泛的实地研究和理论工作，以评估和评价埃及的自然资源、工业潜力和农业项目。他们认为埃及有能力成为欧洲商业和工业的一部分。^①

阿里的工业化计划立足本土，从民生需求入手。鼓励纺织厂使用本地生产的棉花和亚麻，从叙利亚和黎巴嫩引进桑蚕和桑树，扩大丝绸生产和制造；从印度引入克什米尔细毛山羊，以增加羊毛产量。^② 到 1830 年，埃及已经建立起各种现代化工厂，可以生产棉花、羊毛、丝绸和亚麻纺织品、糖、纸、玻璃、皮革、硫酸和其他化学制品。更具创新意识的是，阿里的工业化模式并未止步于生产消费品，而是在两个独立但相互依存的重工业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是生产消费品的机器和设备。除了从欧洲进口的原型机外，埃及每年必须进口大量铁和铜，用于造船、武器和机械工业。其中，纺织业需要的织机都是由当地工人在法国或意大利专家的指导下生产的。当时，土埃及纺织厂的设备几乎完全来自开罗的现代金属车间。^③ 二是通过建立军工厂（开罗）和现代化的造船厂（亚历山大）直接为日益壮大的军队服务。开罗的军事工厂是从生产弹药开始的，逐步发展到武器备件的生产，然后是轻武器的生产。亚历山大造船厂也是从维修海军舰船开始的，逐渐过渡到生产零部件以及小型战舰。截至 1838 年，对工业设施的投资达 1200 万英镑，有 30000~40000 人在工厂工作。^④

有学者认为阿里的工业化战略是世界体系结构下的被迫发展，也是阿里军事扩张野心膨胀的结果。但是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看，一旦军队的需求得到满足，民用部门——尤其在城市地区——就会扩大现代消费品的数

-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91, p. 59.
 - ②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6.
 - ③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38.
 - ④ Charles Issawi, "Egypt Since 1800: 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1, pp. 5-6.

量,因为这些产品比传统的小规模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要便宜得多。因此,阿里王朝最初的工业现代化虽然是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但相关的工厂最终还是为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将它们的受益范围扩展到了军队之外。例如,民用部门吸收了当地生产的大约80%的棉花,以及几乎全部的糖、靛蓝、纸张、墨水、玻璃,更不用说机器了。^①通过示范效应,现代工厂系统生产的消费品具有了大众性。在阿里的统治下,其有序改革颇见成效,并为国家的壮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后劲。

然而,当阿里为寻找新兴工业市场沿着传统商道向外征服和扩张时,引起了欧洲列强的顾虑,它们担心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埃及作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强大力量的崛起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当阿里寻求开发叙利亚资源时触犯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就联手奥斯曼帝国及其他欧洲强国,迫使他从叙利亚撤兵,作为回报阿里家族获得了对埃及的统治权。然而,埃及在形式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更重要的是1840年和1841年,在英国的干预下,奥斯曼苏丹和埃及政府的谈判限制了埃及军队的规模,迫使阿里结束了垄断贸易的政策。从那时起欧洲商人可以在埃及所有的市场自由买卖。埃及唯一的商业和经济功能就是为欧洲工业提供原材料。^②很明显,欧洲列强阻碍了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个以埃及为基地的伟大东方帝国的野心。

阿里改革开启了埃及现代经济转型之路,使埃及从19世纪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而走在了中东其他国家的前面。马克思赞誉穆罕默德·阿里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③他凭借自己的魄力和智慧、“远见和企业家才能”为埃及旧社会组建了新秩序,他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带有相当大的风险。当时埃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少劳动力,工业化项目更加剧了人力资源的短缺。但是,他向数千名技术娴熟的外国人打开了埃及的大门,这些人帮助他实现了他

① Jean Batou, "Nineteenth-Century Attempted Escape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Cases of Egypt and Paragua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16, No. 3, 1993, p. 285.

②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8.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22页。

的工业愿景，培养了有天赋的埃及年轻人，发展了他们的技能。虽然，随着埃及工业化的停滞，很多外国技术精英先后离开了埃及，但是也有部分人留了下来，把埃及当作自己的家。几十年后，他们的一些后代成了熊彼特所谓的“现代企业家”，并成为埃及未来几代人直至 20 世纪创业活动的根源。^①

二 伊斯梅尔融入世界体系与依附型经济的生成

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其家族在埃及的稳固统治应该建立在欧洲式的改革之上。但是其继任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1848~1854 年在位）却反对埃及在欧洲人的介入下取得的任何现代化进步，甚至规定了外国人在埃及居留的条件。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Mohammed Sayyid Pasha, 1854~1863 年在位）虽然恢复了阿里时期的农业、灌溉等项目，但是他无法抵挡向欧洲金融机构借款的诱惑，结果给其继任者留下一笔不小的债务。他还授予法国领事费迪南德·德·雷赛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这就给 1863 年上台的伊斯梅尔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雄心勃勃的伊斯梅尔通过投资大型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埃及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使埃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坚信只有欧洲人才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伊斯梅尔的经济发展路径遵循的理念是借助外部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于是，伊斯梅尔开始加快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

伊斯梅尔统治初期恰逢美国内战时期，其间国际棉花价格飙升，这为埃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入。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对外资本输出竞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伊斯梅尔宏伟愿景的实现。为此，伊斯梅尔着手于扩张性的公共财政以推进埃及的现代化。^② 现代化的领域包括大型灌溉系统、交通运输、通信网络、教育扩展，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

①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il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0.

②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il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2.

伊斯梅尔深知埃及人不具备承担如此复杂的现代化工程所需的风险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因此,他向外国资本和技术人才敞开了大门,并鼓励外国投资流入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于是,拥有各种技能的侨民纷纷涌向埃及,1872年涌向埃及的欧洲人口有8万人,^①他们活跃在农业、工业、贸易、金融、运输等领域。

苏伊士运河的设计、实施和管理无疑是跨国性的。这项工程规模庞大,需要在数年内动用大量人力和资本资源。由于工程早期进展较慢,为了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这项工程,法国的工程师们决定使用更先进的机械挖泥船和蒸汽挖掘机进行挖掘。来自多个国家的大量熟练工人参与了项目建设,其中法国人在工程和管理工作中占多数,意大利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基本从事维护、供应等方面的较低技能工作。但是,项目资本需求远非埃及所能满足,伊斯梅尔利用他在欧洲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庞大网络中的影响力,争取了一笔国际银团贷款为该项目融资。^②参与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项目的除了法国,还有美国、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③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和奋战,地中海和红海的水域在100英里(1英里=1609.344米)的运河水道中汇合,运河开通。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和开通加强了埃及与外界的联系,并提升了埃及在国际航运中的地位。1869年,埃及政府举行了精心设计的仪式来庆祝运河的开通,政府邀请了欧洲政要,旨在表明埃及确实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的一个合法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不是伊斯梅尔在欧洲政治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力和人脉,这个项目就不会在他执政期间完成。^④伊斯梅尔也因此获得了领导力的光环。对于有抱负的欧洲投资者和金融家来说,伊斯梅尔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埃及成了他们投资的场所。伊斯梅尔也进一步向国际投资者敞开了埃及的大门,并向他们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其中最引

①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0.

②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3.

③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3.

④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3.

人注目的是，重申了他的前任赛义德最初引入的外国人优待条例（Capitulation regime）。这一条例包括免税和使外籍人士不受埃及法律管辖的特权。当然，这也阻碍了埃及民族经济的发展。

起初，外国资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棉花生意上，参与了埃及棉花贸易的各个阶段——从收集、分拣、打包到轧棉、船运到国外的纺织厂。所有这些企业都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这种经济扩张极大地推动了埃及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在伊斯梅尔统治期间，用于加强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大约为 4000 万埃镑，这些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国投资和贷款，条件往往对埃及非常不利。^① 据估计 1862~1873 年的借款约为 6850 万埃镑。^② 当然，交通和运输建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共挖掘 112 条水渠长达 13500 公里、修建铁路 1456 公里、铺设电报和电话线 4000 公里，设立国家邮政总局以取代外国侨民开办的各种邮局以及开办埃及轮船公司，^③ 在不同的城市节点上建有 400 座横跨尼罗河的桥梁。此外，在 1871~1873 年，改进后的亚历山大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好的港口，拥有 566 公顷的外港和 188 公顷的内港，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水域。^④ 诚然，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对棉花这一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埃及开拓国内外市场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斯梅尔试图把埃及建成世界主要产棉国和欧洲棉花的供应基地。在其统治期间，棉花种植遍及上下埃及，棉花产量从 1860 年的 50.1 万坎塔尔增加到 1879 年的 312.4 万坎塔尔，耕地面积从 1862 年的 416 万费丹增加到 1877 年的 474.3 万费丹。^⑤ 棉花出口量在 1863~1865 年翻了一番。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受美国棉花市场的竞争，埃及棉花出口减少 1/5。但

-
- ① Mohammad A. Chaichian, "The Effects of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on Urbanization in Egypt, 1800-19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1, 1988, p. 28.
- ② K. M. Barbour, *The Growth, Location, and Structure of Industry in Egypt*, New York: Praeger, 1972, p. 45.
- ③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141~142 页。
- ④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9.
- ⑤ Mohammad A. Chaichian, "The Effects of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on Urbanization in Egypt, 1800-19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1, 1988, p. 28.

是伊斯梅尔不甘心退出国际市场,决心利用埃及良好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发挥希腊人在棉花种植方面的技术,^①继续种植棉花,使棉花的出口量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保持在100万~300万坎塔尔。^②但是,这也表明埃及越来越依赖“单一作物”经济。而且,他还利用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危机和蔗糖产量下降的时机,积极发展甘蔗生产。到19世纪70年代,仅上埃及就有5万~7.5万费丹耕地用于种植甘蔗,其中大部分种植在伊斯梅尔拥有的地产上。^③甘蔗的大面积种植,为埃及现代制糖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伊斯梅尔依赖外国专家和外国公司为他的工业企业和建筑项目提供机械和其他材料。从1873年开始,他着手恢复和发展军工企业和与棉纺织业相关的产业。其中发展较快的是轧棉厂和制糖厂。到1863年初,已经有近80家轧棉厂,能够加工1/3以上的农作物。^④到伊斯梅尔统治末年,埃及已有64家糖厂。为了有效发展制糖业,伊斯梅尔在该行业生产的各个阶段都聘用了外国专家。但是,企业聘用的外国专家的薪金、进口燃料和原材料的价格也十分高昂,导致了这些工厂的高成本,意味着它们只能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存在。^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来自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希腊人开始在开罗建立卷烟厂。正是这种类型的工业为埃及在19世纪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⑥

伊斯梅尔还十分重视银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许多外国银行被埃及蓬勃发展的业务所吸引纷纷到埃及开展业务,银行业活动密切了埃及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金融联系。到19世纪下半叶,英法等国家多家银行在埃及建立分行,如盎格鲁—埃及银行(1864年)、奥斯曼银行(1867年)和里昂信贷银行(1875年)。事实上,一些埃及本土商业家族参与筹建

①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0.

②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40页。

③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 - 1914*,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9, p. 136.

④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 - 1914*,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9, p. 138.

⑤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 - 1914*,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9, p. 150.

⑥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 - 1914*,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9, p. 152.

本土金融机构，推动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业相继发展起来。所以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埃及商业运作环境良好，在埃及建立了不止一个交易所。

然而，伊斯梅尔融入欧洲经济的同时，也给埃及带来了财政上的灾难。由于国家的大部分投资用于长期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的能力在短期内明显不足，致使到期债务通过签订更多的贷款来偿还。然而，由于利息的增加，贷款数额越来越大。1871 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撤回了对埃及很多公共工程的投资，无奈之下伊斯梅尔将他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卖给英国人，英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40%），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1876 年，埃及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当年埃及政府的债务达到 7100 万英镑，其中外债为 6800 万英镑，每年需支付利息 500 万英镑，超过埃及政府岁入的一半。^① 在这种情况下，伊斯梅尔被迫宣布财政破产，按照英法等国的提议成立了公共债务委员会。由英法两国负责监管埃及国库收支，以确保能够实现贷款的分期偿还并支付利息。1878 年，英法两国代表在埃及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部长等要职，埃及的财政大权就此丧失。在愤怒的埃及民众的强大压力下伊斯梅尔被迫下台。

伊斯梅尔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其改革目标在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耗资巨大但也确实为埃及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切实的成效。美国的总领事在 1876 年报告中说，伊斯梅尔于 1864~1876 年在埃及进行的改革是显著的，没有先例。据统计，埃及的年收入由 1864 年的不到 500 万英镑上升到 1875 年的 1.459 亿英镑，同期出口从 2960 万英镑增长到近 6200 万英镑。^② 不可否认，伊斯梅尔的欧洲化改革在现代化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埃及人意识到了现代世界的优势。但是他也导致埃及经济发展的依附性，并为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外围成员做了准备。

综观伊斯梅尔经济改革之路，其依附型经济的形成具有必然性。一是完全外援内建理念。为了快速走上欧洲发展之路，伊斯梅尔没有充分发挥本国人力和物力以及外汇收入来发展强国之本的民族工业，而是过度依赖外来资本和技术，最后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当然这与伊斯梅尔的拜金主义意识与慷

① 哈全安：《中东史 610—2000》（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 505 页。

②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91, p. 78.

慨大方性格,如个人的挥霍、贿赂、赠予等行为加剧了财政紧张密不可分。二是忽视了高成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经济效益。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也能推动生产者提高生产率和利润,但是短时间内却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直接利益。除了苏伊士运河,几乎所有其他公共工程项目都没有产生有效现金流。这也是当今新兴市场国家战略投资的一个重要教训。三是伊斯梅尔忽视了国家经济管理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教训,即“枪炮与黄油”的问题。受埃及帝国思想影响,伊斯梅尔持续对外进行军事行动极大削弱了埃及经济实力,尤其是1875~1876年的埃塞俄比亚战役对埃及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其中他也低估了现代世界体系规则的制约作用。

三 英国殖民统治与埃及经济主权意识的觉醒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埃及进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82~1922年),也加速了埃及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到20世纪初埃及彻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①英国占领埃及旨在保护其在埃及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作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英国希望在运河沿线驻扎军队,以保护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作为埃及银行债务的主要持有人,英国希望确保偿还这些债务;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英国希望保证原棉流向英国纺织业,并为其制造业产品垄断一个有前途的市场;作为一个殖民霸权国家,英国希望参与埃及蓬勃发展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活动,以进一步促进英国获得利益。^②因此,在经济上,英国对埃及采取了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策略。^③

英国先从整顿埃及公共财政入手进行改革,避免欧洲强国干预埃及,以维系英埃关系的稳定,独占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由于埃及财政混乱、管理落后,英国派遣曾长期在印度任职并在财政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克罗默勋爵前往埃及兼任总领事,为埃及提供财政方面的建议和协助财政工作。

① 刘会清、王泰:《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及交往性特征》,《西亚非洲》2007年第9期,第58页。

② Naï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9.

③ Naï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9.

克罗默首先对埃及进行财政改革。简化行政账目，废除每年预计近 200 万埃镑的非生产性税收（盐税等）。其次是修改清算法。根据 1880 年的清算法，埃及的债务定为 9837.7 万英镑，财政受制于英、法、德、奥、意等强国，埃及政府只能自由支配其收入的有限部分。1885 年在英国建议下，欧洲列强修改了 1880 年清算法，英国获得更多的支配埃及财政收入的自由。而 1904 年英法友好协定中清算法的重新修订，标志着英国基本掌握了埃及的财政大权。在克罗默的建议下，埃及经历了 1883~1888 年“与破产赛跑”，1889 年埃及财政状况好转，实现收支基本平衡。根据克罗默 1902 年的财政报告（1882~1901 年）数据，埃及财政出现累计盈余 1000 万埃镑，占公共收入的 2.24%。^①在接下来的十年，政府不仅还清了占领期间的所有贷款，而且还使伊斯梅尔时期欠下的债务减少了一些。

在农业发展方面，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为此，对埃及灌溉系统的改造至关重要，克罗默通过任用曾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水利工程师让埃及重新控制尼罗河，修整了伊斯梅尔统治后期年久失修的水坝和堰。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翻新开罗以北的拦河坝，它控制着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省份的灌溉用水，1902 年阿斯旺大坝建成后，为上下埃及提供了充足的灌溉用水。英国通过建造一系列的堤坝和运河，在埃及完成了将盆地灌溉系统改造成常年灌溉系统的任务，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埃及农民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埃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三角洲地带，尼罗河每年的洪水不再发生，农民收入相对提高。埃及棉花产量由 1886 年的 279.2 万坎塔尔增加到 1914 年的 766.4 万坎塔尔。^②随着国际棉花价格的提高，国家鼓励农民改进种植和施肥方法，进而提高了棉花种植的单位产量。1882~1922 年，埃及棉花出口量（按 4 年的平均值估计）增长了 202%。^③当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棉花的种植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它造成了大量土壤肥力的耗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及人均农业产量开始下降，标志着埃及农业快速扩张的结束。

① Charles Issawi, *Egyp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25.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Egyptian Relations, 1800 - 1956*, Connecticut: Hamden, 1965, p. 173.

③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in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51.

英国不仅把埃及变为其棉花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也使埃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在英国占领埃及的早期,埃及几乎没有外国投资。但是在1900~1907年,随着大规模土地开垦,英、法、比等国纷纷在埃及成立各种股份公司,先后有160家公司成立,资本达4300万英镑。1914年,埃及股份公司实收资本的92%由外国公司控制,^①这些外资的46%来自法国,30%来自英国,14%来自比利时,余下10%由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持有。^②在这些外国股份公司中,银行、抵押贷款和土地开垦这三大经济活动主导了埃及的股份制公司的活动。它们在股份制公司总资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45%和5%。相比之下,从事工业经营的公司的资本仅占总资本的6%。^③

当时埃及多数工业仅停留在棉花及棉种出口前的准备阶段。原棉在埃及经过轧棉、清洗、压榨和打包后直接运往海外。这期间埃及工业只增加了两家盐厂、两家纺织厂、两家啤酒厂,以及一些小的香烟和食用油(从棉籽中提取)工厂。^④最重要的工业是伊斯梅尔时期创立的制糖业,仅供应国内需求。在工业方面,克罗默勋爵的所作所为仅限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应该被划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专门从事着具有天然优势方面的经济活动,并在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中与其他地区交换产品。埃及就应该专门种植和出口棉花,欧洲才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

但是在19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埃及人争取经济主权的意识日益觉醒,他们要求政府加大对股份公司的监管力度,打击高利贷,成立真正属于埃及人的国家银行。1913年埃及商会在开罗成立,著名埃及民族主义企业家塔拉特·哈伯(Tal'at Harb)当选为商会副主席。商会的宗旨在于倡导埃及经济独立,以支持其政治自治。后来,其他大城市也相继成立了20多

-
- ① Marius Deeb, "The Socioeconomic Role of the Local Foreign Minorities in Modern Egypt, 1805-19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o. 1, 1978, p. 16.
- ② Charles Issawi, *Egyp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31.
- ③ Robert Tignor, "Economic Activities in Egypt, 1920-1950: From Millet to Hau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3, 1980, p. 419.
- ④ Naiem A. Sherbiny and Omayma M. Hatem,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52.

家商会，这表明埃及当地企业家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埃及政府和有识之士对埃及经济发展进行了新思考。他们意识到埃及的工业品完全依赖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于是在1916年成立了埃及工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埃及政治家和企业家伊斯梅尔·西德基 (Isma'īl Sidqī)、塔拉特·哈伯以及一些外国和本土的重要经济界人士组成。委员会呼吁埃及人实现经济多样化，减少对单一商品出口的依赖。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进口替代产业。委员会强调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保护，但变革的引擎是私人资本。^① 这一报告在埃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未来埃及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也为后来的埃及民族企业家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1918年，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被视为埃及工业化的路线图，而这些委员则成为推动埃及经济转型的活力群体。

发展民族经济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埃及企业家们冲在最前面。在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企业家塔拉特·哈伯看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否则政治独立就是空话，而经济发展的首要举措是建立埃及人自己的金融机构。所以，他一直关注和思考埃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早在1911年他就向埃及国民大会提交了第一份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详细提案，大会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得到了与会成员尤其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支持。1920年在民族主义热情的推动下，他募集了8万埃镑资金，成立了米斯尔银行 (Bank Misr)，该银行拥有来自地主阶层的124个股东。这是埃及第一家由埃及人筹资和管理的银行。该银行的既定目标就是利用银行资本创造新产业，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多样化。米斯尔银行后来形成米斯尔集团，并成为埃及民族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米斯尔银行与随后成立的埃及农业总会 (General Agricultural Syndicate, 1920)、埃及工业联合会 (Egypti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1922)^② 并称为前纳赛尔时代埃及

①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2.

② 埃及工业联合会的成员主要是在埃及的外国金融家和实业家，到1925年，其90个成员（埃及人不到1/4）的资本估计超过3000万埃镑，雇用大约15万名工人。参见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9.

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机构。^①

总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埃及完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当地外国商业精英和本土地主阶级作为埃及两大社会力量不断增长,他们成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二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对抗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外国商业精英在灌溉、运输、抵押和信贷银行、贸易和棉花种植、附属工业以及农业机械和肥料进口等方面建立各种企业,他们攫取了巨额经济利润,并且享受免税特权,最终激发了埃及人的经济民族主义热情。在20世纪20年代,埃及出现了工业企业阶层,他们通过将在土地和商业上获得的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来经营民族企业。尽管他们只是小部分群体,但是却为埃及人更广泛地参与始于自由时代的现代工业创造了条件。

四 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经济本土化发展的初步尝试

随着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以及现代民族金融机构米斯尔银行的建立,英国在埃及的政治权威以及欧洲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自由主义时代(1923~1952年),^②埃及的政治家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完全独立的权力,而在经济领域埃及领导人努力寻找国家之外的创造力来源,构建经济民族主义,并利用私人财富资源(土地和当地工商业资本)使经济多样化,以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

1923年埃及颁布新宪法,埃及各个阶层都希望政府重塑埃及政治、经济。埃及本土企业家强烈呼吁国家以关税保护和补贴的形式援助新兴产业,废除外国人优待条例,实施新的税收制度,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但事实

-
- ① Robert L. Tignor,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1919: New Directions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6, p. 41. 尽管创始人大多是居住在埃及的欧洲商人,寻求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埃及在该协会中的重要代表性,但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主导着这个组织。联合会代表了埃及资产阶级的不同工业派别,它们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保护性关税、对新兴产业的减税以及有利的劳动立法,以创造新产业。该组织的领导者埃及犹太人利维(Levi)在促进当地工业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② 1923年埃及颁布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从此开始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制时期,直到1952年纳赛尔上台。制宪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埃及建立现代议会制度的初步尝试引起学者兴趣,称之为“自由主义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宪政实验”或“自由试验”。

上，埃及政府很难将其政治议程转化为经济行动计划，以解决埃及的社会经济弊端。因为当时埃及的政治精英并没有想从根本上摆脱与欧洲资本的关系，他们认为外国人在埃及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华夫脱党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埃及政治独立。所以，埃及政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经济愿景。

虽然政府没有选择在重大问题（关税、投降和税收）上挑战西方国家，但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上也在寻求自主性，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为本土企业家敞开了大门，开启了埃及经济本土化尝试。其中最具活力的是企业家塔拉特·哈伯领导的米斯尔集团，尤其是该集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为埃及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性、民族性和工业性资本主义积累的战略框架。这也是埃及自近代以来首次由私人资本主导构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的尝试。^① 虽然该集团的工业化努力仍然处于萌芽探索阶段，但是它成功地推进了埃及经济多样化，提出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增长相平衡的理念。

米斯尔银行成立后一直支持工业的发展，在塔拉特·哈伯看来，米斯尔银行应该成为埃及经济特别是工业变革的先锋。他明确表示将利用银行的财政资源创建新产业，进而推动埃及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米斯尔印刷公司是米斯尔银行投资的首家公司。1924 年，米斯尔银行投资了米斯尔纸业公司和米斯尔贸易与轧棉公司，这标志着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形成。^② 1925 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又先后投资了米斯尔航运公司、米斯尔灌溉公司和米斯尔电影公司。^③ 这些公司从事棉花采购、轧棉和营销等相对简单的经济活动，并不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的技术，米斯尔集团只是聘请少数外国技术专家，以确保公司的“国民性”。到 1926 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棉花收购商，此前棉花收购规模在 13 家银行中仅居第 12 位。^④ 同

-
- ① 李芳洲：《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构建（1920~1939 年）》，《西亚非洲》2021 年第 4 期，第 120 页。
- ② Eric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 1920-194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29.
- ③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6.
- ④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8, No. 2, 1977, p. 169.

年, 米斯尔银行集团业务拓展到国外, 成立了米斯尔—法国 (Banque Misr-La France) 银行, 其目的是为在欧洲的埃及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1927年, 米斯尔银行集团的业务开始涉猎其他工业领域, 相继成立了米斯尔纺织公司、米斯尔丝织公司、米斯尔亚麻公司和米斯尔渔业公司。这些公司在埃及工业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它们的资本规模并不大。1929年, 该银行发表了一份工业化发展报告, 提出了一项十年发展计划, 并呼吁建立一个由政府经营的工业发展银行。该报告建议成立由金融企业家、政府及理论家组成的常设机构, 为申请资助的工业发展项目提供审批; 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呼吁埃及企业家建立纺织、化学、皮革、玻璃等工业企业。同时, 规划新产业的发展, 拟定了一份拟成立的28家股份公司名单, 并强调新产业必须立足国家实际需求, 主要用于满足国内消费。^① 该报告援引的统计数据表明, 人口增长正在超过农业资源,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人口问题。但是, 由于埃及政府主要忙于恢复农业项目, 致使该报告中的多项建议都被忽视。米斯尔银行集团继续以商业银行的身份发挥工业信贷银行的作用。^② 米斯尔银行集团开展大型工业项目, 迫于技术上的需求, 也开始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1929年, 塔拉特·哈伯与德国棉花出口商雨果·林德曼 (Hugo Lindemann) 合作成立了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 这标志着米斯尔集团与外国资本合作的开始。

塔拉特·哈伯还积极响应埃及财政部的号召, 组建埃及商会联合会, 以便各商会在争取埃及经济独立中采取一致行动, 同时联手工业联合会敦促政府给予本土产品以优惠待遇, 降低原材料运费以及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举措。20世纪30年代, 关税改革是影响埃及经济的重大议题。1930年, 西德基政府推出了新的关税法案, 以保护国内投资的新兴产业, 让大地主将他们的农产品出售给埃及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③ 修订后的税法要求对必需品实行名义关税或减征关税, 对半成品和成品实行中等关税, 对所有其他

①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6, p. 70.

②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4.

③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6.